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研究生教育四十周年。1984年初“中心”成立,12月我国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由电影所转入“中心”完成学位论文答辩。1985年,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收电影历史及理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自1994年独立招生,开始进一步开拓和发展研究生电影教育创新之路。本期刊登郦苏元、仲呈祥、陈犀禾、单万里四位学者回忆文章,将陆续刊登钟大丰、胡克、饶曙光、李迅等学者的文章,以兹纪念。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教学忆旧

■文/郦苏元



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由左至右:前排汪岁寒、贾粟、程季华、陈荒煤、沈嵩生、徐庄;后排杨正铎、李少白、邢祖文、奚姗姗、余倩、郦苏元、王亮衡)(1984年12月)



1997届研究生论文答辩会(1997年)(由左至右:谭春发、王安奎、陈少舟、郦苏元、胡菊彬)



《电影学研究》(1997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走过了整整四十年,前近二十年艰辛创建,后二十多年稳步发展。

1984年电影中心成立后不久,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加强研究力量,建设电影理论队伍,于10月设立了研究生部(王亮衡任副主任,后为主任),开始进行研究生教育筹备工作。

当时面临最大问题是缺乏师资,没有评定职称,四个研究室不具备担任导师资格。为解决这一问题,王亮衡根据之前在电影所筹建硕士点时外聘导师的做法,建议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生,以求横向组合优势互补,得到陈荒煤同意。经过磋商,双方一拍即合,遂成立领导小组,陈荒煤任主任、沈嵩生任副主任,电影学院派人协助研究生部工作。

向国家教委申请增加招生名额获准后,12月初招收研究生20多名,攻读电影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学位,设中国电影史、电影艺术理论、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美学四个研究方向。导师由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电影学院老师共同担任,他们分别是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钟惦棠、程季华、罗艺军和沈嵩生、汪流、余倩。

同月中心研究生部为电影所我国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参加的有导师、中心领导、任课老师和参与电影所研究生工作人员。学生全部通过答辩,其中有三名学生毕业后进入研究室。

1986年3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最早研究生电影教育单位,也由此成为我国唯一集科研、档案和教学三位一体的电影学术机构。

然而好事多磨,一场莫名变故突如其来。1987年5月25日广播电视部党组会议决定:撤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生部划归北京电影学院,四个研究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领导。

犹如一阵晴天霹雳,顿时在研究室和研究生部炸开了锅,不说原因没有理由,一纸公文三言两语改变了二十多人命运。大家不甘坐以待毙,自发聚集起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出主意想办法。最后一致同意,直接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申辩,说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的现实意义,反映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请求收回成命。反复修改斟酌后,信件按正常渠道投放到信访站,然后是忐忑不安地等待。

天公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9月8日广电部电影局电话通知:研究生部维持现状,不划归北京电影学院。12月15日又宣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建制仍然保留,不予撤销。事发突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死而复生的真实内幕,至今不明其详。研究生教学得以继续,1988年6月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第一届研究生学业完成,举行论文答辩,全部通过并授予硕士学位。他们学有所长学有所成,日后在各自工作中做出贡献,没有辜负老师们的付出和期望。学位论文后来编成《电影学研究》出版。

1988年7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进行第一次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研究室十多人获得正高或副高职称,有了一定师资力量。12月招收第二届硕士研究生19名及5名进修生,次年9月入学。除原有四个研究方向外,增设外国电影研究、电影批评。导师除电影学院老师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有奚姗姗、何振淦、李恒基、戴光晰、何鸣雁、仲呈祥、王金国、王亮衡、郦苏元。此时陈荒煤已离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领导岗位,学术委员会也不复存在,都不再担任导师。三年后有18名研究生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1992年进行第二次职称评定,研究室又有一批人晋升为高级职称,师资问题基本解决,遂与电影学院脱钩,开始独立招生。1994年招收研究生17人,导师全部由研究室担任,新增蔡洪声、傅郁辰、杨远婴、谭春发、胡克,专业方向也作了相应调整。这届学生于1997年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因机构改革编制紧缩以及人员变动,1998年四个研究室合并为一个研究室,研究生也只招收9名,2001年毕业并获得学位。

从1985年至2001年,一共招收四届,每届间隔四年甚至五年,可见创建之难。难在一师资,二设施,三经费。无论是电影所还是资料馆,都是事业机关而非学校,不具备必要的教学条件。没有师资力量和办学经验,没有起码的教学生活设施,初创阶段外请老师上课,教室只有“小白楼”一间办公室,学生住出租房,用煤气罐做饭。电影所没有财权,身无分文要啥没啥,合并后给资料馆财政带来很大压力,更不用说有足够专项教育资金。研究生教育是一项新的工作,对其了解不够,认识不一,存在争议在情理之中,需要时间沟通磨合,以取得共识和支持。这一切,都使得研究生招生不能正常进行,走走停停,艰难跋涉。

多年来研究生部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再坚持,努力又努力,逐步完善教育机制,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与各部门通力合作齐心协力,终于将研究生教育发展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一项重要业务工作,实属功不可没。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教育有其自身特点,既注重系统性知识性,掌握坚实的电影理论基础,又强调专业性研究性,培养独立思考创新能力,形成以电影史论研究为主的教学特色。研究生导师将授课与研磋结合起来,取得教研相长成效。

资料馆是一座电影宝库,有极其丰富馆藏,中外影片数不胜数,文图资料应有尽有。除业务看片之外,还专设“谈片课”,三年学习期间系统观摩中外电影史上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经典影片不下数百部。学生学到了电影专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看片感受,练就了对影像解读能力基本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电影是一种诉诸视听直观艺术,看不到影片,只能纸上谈兵。这一得天独厚优势,至今无人企及。

四十年,经过一拨又一拨师生的不懈坚持和共同努力,从开一代先河到桃李满天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生电影教育基地,其未来可期前途无量!

我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

■文/仲呈祥



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专职编剧,并一发而不可止地以《凤凰琴》《红蜘蛛》《笑傲江湖》《征服》《燃烧》《国家行动》《黎明前的暗战》《湄公河大案》《扫毒风暴》等享誉屏坛。

1994年,我又招收了第二位攻读硕士的研究生陈伟,她的研究方向是电视剧历史与理论。学成后,她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从普通工作人员一直做到副司局级干部。其间还为江苏常州写出了一部夺得“飞天奖”的反映当地革命历史文化的长篇电视剧《果子巷》,听说还被授予了“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

再到1998年,我招收了一名来自三联书店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于彦琳攻读电视剧历史与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她个性鲜明,自主意识强,相当男性化,据说曾剃过光头。我亦顺其自然,很尊重她的选择和爱好。毕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了。之后,自1999年起,我便受命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攻读艺术学的博士生了。

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供职期间,为研究生培养做过的另一桩最有意义和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专职陪同从上海请来的王元化先生为研究生开“中华文化史”专题讲座。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钟惦棠先生提出对首届研究生,要补补于电影专业之外的更基础更重要的哲学、文化学课。他建议从全国学术界邀请一流学者来开课。他首先想到了他的挚友王元化先生。其时,王元化先生已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专心治学。于是,先是由在研究生部工作的饶曙光专程赴沪联系,待到王元化先生抵京后,开了系列讲座都由我具体陪同。这无疑给了我一次零距离向王元化先生求教的极好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研

■文/陈犀禾



李少白(前排左二)、陈犀禾(前排左一)

转眼,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电影学研究生的生活已经过去四十有余了。

我是1982年2月寒假以后进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简称“文研院”,即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在那之前,我在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考入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在报上看到文研院的招生广告,其中也有电影系,招生名额三个,导师是著名电影史学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李少白,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我在考入大学前在宜宾造纸厂当工人时,就一直对电影艺术感兴趣,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关于“文革”中一对年轻人命运的故事,投到“峨影厂”。“峨影厂”编辑曾经找我谈过修改意见,改了几次,后来不了了之。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专业是中国语言和文学,业余也写一些小说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对艺术创作兴趣不减。1978年看到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各专业招生的消息,曾感到十分羡慕和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电影梦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没想到圆我电影梦的机会在我大学毕业时再次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的这一次招生也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中第一次招收电影学的研究生。初试的笔试是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参加的,我当时的状态极好,卷子写得满满的。记得初试有一道题,是在当时流行的十部电影中选一部进行评论。我选的是日本电影《人证》,中心观点是阐述影片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如何最终泯灭了人性。这些道理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看惯了样板戏和高大全模式电影,再看日本电影,不免有种震撼的感觉。下笔的时候文思泉涌、气势如虹,自我感觉极好。复试则是到北京去面试。那时已是1981年的秋冬之交,一个同学还借给了我一件绿色的军大衣。

复试是在恭王府深处所谓“九十九间半”中间电影所的一个办公室进行。办公室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和我想象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相去甚远。屋子里一圈人靠墙围坐着,我被安排坐在靠门口的一个椅子上,我的对面是李少白老师,还有电影所负责和我们考生接洽的杨振铎老师,

其他老师大都不认识。复试的题目当场抽签,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理论的问题。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各种创作思潮和理论十分活跃,在大学的时候对这些发展也十分关注,于是就滔滔不绝地阐述起来。席间有一个老师(后来知道是郦苏元老师)对我的阐述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了质疑。我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自圆其说。下来以后,心里却不免有点担心自己的“顶撞”。当天晚上,杨振铎老师出乎意料地来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天津南北地聊了一会儿,没有直接谈到考试的事情。但是从他的态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对我不利暗示。毕业分配前夕,我得到了电影研究所的正式录取通知。当时激动和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同学和老师纷纷表示祝贺。

当我1982年春节以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报到时才知道,电影研究所这次录取的学生不是三个,而是六个。后来研究生部的老师对我们解释说:由于电影所的老师对这次考生的质量比较满意,所以决定扩大招生名额,从原来的三名变为六名。他们是:钟大丰(北京师范大学77届)、张爱华(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王汉川(山东大学77届)、鲍玉珩(首都师范大学77届)、刘牛(福建师范大学77届)和我(西南师范大学77届)。导师原来只确定了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一人,后来又

聘请了著名电影评论家和剧作家贾霁。其中,钟大丰、张爱华、王汉川为电史方向研究生,导师李少白;鲍玉珩、刘牛和我为电影理论方向,导师贾霁。另外,两个方向还各设一个负责专业辅导的班主任,电影史方向的班主任是王亮衡,电影理论方向是郦苏元,杨振铎是我们的辅导员,我是电影系学生的班长。

由于电影所是当时国内第一次招研究生,北京电影学术圈内对电影研究所首开国内招收电影研究生的先例颇有议论,主事的李少白老师面临很大压力。当时贾霁老师身体不好,较少到研究生部和电影研究所来。主要是李少白老师和他的助手王亮衡、郦苏元、杨振铎等费了很多心思来设计课程,制订教学计划,聘请讲课老师,联系影片观摩,安排各种教学活动。李老师对我们学生要求严格,几近苛刻,很少表扬学生,同时对自己的教学工作也极其认真。他给我们主讲了“中国电影史”这一核心课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种种细节,对李老师当时面临的各种压力及其一番苦心,有更深体会。如李老师当时的神情以严肃居多,观点表述也力求严谨,并不似后来的放松、超脱,并常面露笑意。好在当时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整个教学体系比较完备和成熟,戏曲、音乐、美术等系已办学多年,且大师云集,如戏曲所的张庚、郭汉城,美术所的王朝闻等,给电影所增加了不少助力。 (下转第8版)